

母校惠存!

阶级教育自编参考资料

校友李少元

2004.12.6.

LSY-2

21

老工人钱玉光家史。 K8

钱玉光口述

李少元

李彦奎

整理

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，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，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，他们除双手外，别无长物，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，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。

——毛泽东——

《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》

忆苦思甜

——退休老工人钱玉光家史

我叫钱玉光，北京人，生于一九〇一年，今年六十三岁，出身于城市贫民，回想一下解放前的生活是很悲惨的，打记事起，我就没过一天好日子。

一、求学难

小时候，我们家共有五口人，父亲当壮工，母亲给人家做外活，也叫“缝穷”，我们一共哥三个，我是最小的一个。当时，全家就依靠父母的劳动为生，生活境遇是很不好的，两个哥哥一天学都没上过，拉车的拉车，捡煤核的捡煤核……，我九岁那年，父母看我们一家都是睁眼瞎子，便勒紧了腰带，从日子里挤出点钱，勉强供我去上了私塾，我还记得是在同井大院路东文昌阁，老师姓乐，每个人每月要交学费四吊，合铜子四十枚，除了交学费之外还要出钱买扫帚、簸箕、窗户帘等等，遇有老师生日还要花钱给老师祝寿，就这样每月要用许多费用，家里哪儿供得起，因此念了两个月就退学了。

当时也有小学校，但是那是给八旗子弟念书用的，不在旗的进不去。不瞒大家，我姑父在旗，有钱，我就

冒充是我姑父的儿子才进了小学（白庙胡同第五小学），开学的时候正值寒冬，从住家的中南海走到白庙胡同，路远不说，开学的时候，讲究要戴红缨帽，我们买不起，好不容易才借了一顶，还得用钱买书，父亲拿不出钱来就打我，说我事多，逼着我空手上学，我当时穿个破大褂儿，也没有棉鞋，饱偿了阔少们的白眼。

在我十一岁那年，旷了两个月的课，当时家里吃不上饭，二哥刚出去拉洋车，因年小拉不动就让我在后面推，可我当时还只将将够得着弓子头的铁皮洋车，上坡时坐车的就吆喝：“小子，使劲呀！”不久之后，又勉强能生活了，我又回去上学，因为落了课，就安排到己班（第六班），而我的脚已冻坏了，走不了远道，只好转学了。

这次转到了绒线胡同（宗氏觉罗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附属第十小学），因为念书用功又升上了甲班，可家里仍是时常揭不开锅，早晨上学就饿着肚子，我们学校门口有个卖豌豆的，我每听到那“豌豆……”的吆喝声就扎心，心想：“为什么人家有钱子弟有吃有穿，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就吃不上穿不上呢？”当时我时常在垃圾堆里捡点破纸、秃笔头，过年过节时大人给的钱不花买本书，买块墨，就这样结结巴巴的上完了小学（初小）。

升高小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咱人穷骨气壮，全校拔功

课好的保送了五名，我就占了其中一名。

没钱买书我就鼓着勇气，拿学过的旧书包上皮儿，冒充新书就上学堂了，有半个多月都是上课看同桌学伴的书，课下也是借书看。同学一给脸色，自己心里就难受，老师对穷学生怀着厌恶的感情，他知道我没书，课堂上遇到什么难题，成心叫我。还记得有一次，把我叫起来，叫我解释：“什么叫‘乡僻之妇孺’？”我扫了一眼同桌同学书上这五个字，就解释对了，老师不得不点了点头。课后我想：买不起书，连老师都看不起，心里挺难受的。一天，父亲挣钱回来，给我买齐了八本书，我心里高兴极了。我还记得有书的第一天，我把老师讲的课（包括一课国文《驼鸟》）都给背下来了。懂得了念书机会来之不易，也就知道好好念书。

当时真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学习用费问题：外国到中国倾销一种“燕烟”，一枚钱一盒（五只装），五个空盒能换一只短铅笔，我就一个一个地积攒，盼父亲抽够了五盒烟，到棋盘街换三寸来长的一根铅笔，笔芯硬得拉纸，我仍然如获至宝；有一次，胶轮马车在马路沿子上啃掉了一小块胶皮，我就把它捡起来，当橡皮使，用的时候，字是擦掉了，可纸也黑了；其它的用具只得先从学校赊购。有一次，我妈给人送外活，跟人家大学生要了一点白纸和复写纸，我把它精心保存，都舍不得用。

我在十三年那年，还是经常挨饿，不定那天干脆连火也不升，父亲在俄国府当小工，有时从垃圾堆里捡回小土豆、黑面包头儿，我们也吃，有时还买一个子儿的杂货菜汤，酸臭得跟猪食一样难以下咽，有一次母亲给兵部湾蒸锅铺送外活，捡回许多人家不要的酸菜梆子，晚上煮了一锅，吃起来比现在吃炸酱面还香。唉！真是穷人家灾难多，这一年父亲做小工活儿，抬土摔了一个跟头起不来，落了个瘫痪，当卖一空，病也没瞧好，大哥卖兵到山西，二哥到京北一带给人当使唤小子，家里就靠母亲做外活，维持三口人的生活，生活更加困难，经常吃不饱，上到后几节课肚子饿得轱辘轱辘叫。还有一天，晚饭没吃就睡了觉，第二天早晨，没挣得钱就上了学，中午回来，一看还没升火，在屋里转了个弯又上学了，饿得直不起腰来，嘴也发了味，下午回家，看见母亲坐在炕上赶活，还没赶出来，不能领钱。母亲从炕上翻出一个子儿，让我买了一斤青枣（红枣贵），两个小子儿一斤，吃了就睡觉了。第二天卖了一件可能是破衣服，吃了一顿窝头。肚子挨着饿，再加上赊欠成绩纸三十七枚钱，老师追着要，羞得我害怕上学校去，这个学还怎么能上下去呢？不久就放暑假了，还差一个学期就毕业了，但实在上不下去了，从此我就失学了。

二、奔波

失学以后，我就挎着篮子捡煤核儿去了。在捡煤核的时候，在街上、胡同里常常碰上以往的学伴，看看人家都背着书包去上学，看看自己却挎着篮子满街奔波，心里十分难过，遇有这种情况，我便咬咬牙又去捡我的煤核。尽管这样，我的求知欲仍然十分强，白天捡了一天的煤核，晚上便去宣武门里通俗图书馆去看书。

这年冬天，天气冷得很，连总统府当兵的和站岗的警察都冻死过，可是，我下身却只穿两条破单裤，露着膝盖，上身穿着一件破夹袄和一个破棉坎肩。每天，天蒙蒙亮就起来去捡煤核。一个冬天的早上，凛冽的西北风卷着地上的积雪，猛烈的吹着，风吹在脸上象刀子刮一样的疼，我正在旧廉子胡同的一个垃圾堆上捡煤核，从一家宅门里出来一个倒土的老妈子，一看我穿着这样单薄，揪着我的衣服心疼地说：“小子，这么冷，还蹲在这儿，不找冻坏了。”说着摇摇头，连着啧啧了好几声。我瑟缩着身子，一边说不冷，一边离开了这里。

等走到了新华街，南边来了一个人，向我招呼道：“小孩，打执事你去不去？”我听说是打执事，一想能挣几个钱，连忙说：“去呀。”说着他就带我到宣武门××小扛房，寄存了篮子，先给了我四枚钱，我花了二枚买了点东西吃了，然后，我就穿戴上花衣花帽，背上闹

丧鼓子，来到新廉子胡同办丧事的那一家门口。说来真巧，等我们进来的时候，我一眼看见一个熟识的人跪在灵旁，他是我的学伴，叫王德林，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家办丧事。我当时羞得真是无地自容，便把伞打得低低的遮住我的脸，好容易盼到这通鼓打完了，出了棚口，脸才不那么热了，坟地是在永定门外大红门，等到黄昏时我又得了三文钱，就连忙往家赶，半路上，肚里饿着咕噜咕噜乱叫，我又花了一个小子买了点花生充饥。走到大栅栏的时候，想起我母亲爱抽玉丰号的潮烟，便买了两个子的。等到家的时候，天已黑黑的了，这时母亲正着急，一见我便眼泪扑簌地问：“孩子，一整天的工夫，你上哪去了？”我把经过向母亲说了，当我把那包潮烟和剩下的钱给母亲时，母亲难过得落泪不止。

记得，在拣煤核的时候，我还常给《小小日报》主笔程道一买东西，跑道，他瞧我贫苦，便登了一则广告，大意是说贫民请求施舍，虽然我得了“慈善家”的一点施舍，但我知道无数象我这样的贫民仍在死亡线上挣扎，他们用小恩小惠施舍个别穷人，不过是为了大肆鼓吹自己的慈善。其实他们剥削穷人，要比他们施舍的那点多千百倍。

失学以后，虽然那时我还是个小孩，但是为了帮助家里挑起生活的担子，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捡过煤

核，打过执事，给人跑过道，后来我还卖过热茶，每天担着茶罐到闹市的街头去摆茶摊，从十五岁起，一直干了四、五年，我偿到了人间生活的苦头。

记得有这么一回，刚开始卖茶不久，我得了转肠痧，这病一犯起来，肚子就拧着疼。有一天，我的肚子疼起来，母亲便不叫我去卖茶，但我一想那刚沏好的茶，舍不得白白扔掉，我就决定还去。母亲不放心，便帮我抬去，走到双栅栏胡同的时候，我的肚子突然猛烈地疼起来，我疼得站不住，便躺在地上。家里穷得连饭还吃不上，哪里有钱去看病，只好忍着耐着，疼得乱叫，母亲见我这样也难过得暗暗流泪，左邻右舍，富人家见了根本不动心肠，穷人是有心无力，爱莫能助。我的病一天天地厉害起来，在旧社会里，还是天下穷人同相怜，几家穷邻居看我的病愈来愈重，便凑了点钱，给我母亲送来，母亲感动得连话也说不出来。吃了几剂汤药又扎了针，我的病才慢慢有了好转。因为病好的很慢我不能出去找营生了，心里很着急，便硬着脸皮去姑姑家。真没想到，刚一开口，姑姑就怨声怨气地说：“你们怎么又来苦害我，老跟我要钱……”，最后，她装着没钱去别屋拿来十个子儿，把我打发走。走到半路上，我才发现里面还有一个不能花的便钱，我气得不得了，心想：“死了，也不再登你们的门口。”

病好了以后，我经人介绍去给一家宅门里当使唤人，每月薪水为 120 个小子，我心想，这回总算有了指望，受点累也不怕，我做饭，打扫庭院……，总之一切杂活都做。不想“好日子”不长，有一回吃饭，端饭的时候，一失手把一个菜碟掉在地上，虽然碟子没打了，可是这家太太却不高兴了，把我大骂一通，我吓得浑身直打哆嗦，便跑回家去了。我又去卖我的热茶，这时茶水不怎么卖钱，我早晨照样去捡煤核，晚上便去拉小帕儿，倒油水车。不久，经人介绍我又去“值卫宪兵营”侍候四个人——一个姓冯，两个姓张的，还有一个姓丘的，绰号瞎丘三，他是给营长赶车的。这个人很凶暴。我给他们四个人做饭，干零碎活，晚上还得提夜壶，他们几个人整天大吃大喝，我只能咸菜就饭吃，我不但吃得坏，气也不知受了多少。最厉害的是，有一天，天气十分冷，白天我用开水把瞎丘三的夜晚壶给烫了，可是忘记把水倒掉，晚上一拿，才发觉冻了。丘三一见火了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照着 my 脸就是两个大嘴巴，我顿时被打得头昏目眩，眼角都有了血印。我哭哭啼啼地跑回家去。我这时才是一个十六、七岁的孩子。母亲看了只有心疼地落泪，两个月后，我的伤才养好。

在我十八岁那年，我父亲的病不知怎么的好了。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这时我们爷仨——父亲、哥哥和我，

便当了清道夫，拉一辆车每月可以挣钱六十五吊钱，我和父亲两人拉一辆，我哥哥一人拉一辆。这活尽管又脏又累，挣钱又不多，但生活总算有了着落，为了糊口度命，我们便勤勤恳恳的干着，但是谁知，这碗饭也没吃长。事情是这样的：有一次在府里一个姓陈的劣绅叫我二哥将他家的脏土撮走，我二哥因一疏忽忘记去拉他家的土，这个姓陈的劣绅便生气了，说我二哥有意不去，于是便串通巡警，说了一些坏话，便把我们给辞了，这把我们爷仨气得鼓鼓的，在那个鬼世界，你想靠卖力气吃饭，都不行。

自丢掉清道夫的营生后，二哥便去学瓦匠，父亲只好呆在家里，我又继续去卖茶。冬天，我还有时去当响家（吹鼓手的一种）。有一次，去通州干了一次，挣了二十四个子，晚上十二点才回家。后来茶水不卖钱了，我又去薏落花生。从广安门外深州馆去薏，五个子儿一斤，到前门一带能卖六个子儿一斤，每天早晨早早就得起身去，因为家里没钟表，有一天夜里大约十二点钟就起来了，宣武门外警察不让我们过，我和另外一个孩子便抄小道到广安门等城门，冻了几个钟头好容易盼开了城，才薏到三十斤落花生，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候为了维生，我不得不在各条生活的小道上到处奔波。

三、鬼世道

从二十几岁起，我就开始拉洋车，一连拉了二、三十年。拉洋车在旧社会里是个最下贱的职业，“臭拉洋车的”“胶皮”这就是人们对这个职业的称呼。尽管拉洋车是这样被人看不起，可是这碗饭也不是那么好吃的。生活终于把我逼上了这条道路，我刚开始学拉洋车时，是拉“三等晚”（在那时拉洋车分为三等，一等是拉整天的，是拉座容易的，二等是拉半天或晚上，也是比较容易拉座的，等到拉晚的都回去了，再租车就称为“三等晚”）。一次，在枣林大院遇上两个手持马棒子的当兵的雇我的车和另一个人的，没容讲价坐上车就叫我们往中和园去。因为那个拉车的是老手，跑起来很快，我是个新手跑得慢，一会儿就被落下了。这个当兵的就火了，一边骂骂咧咧的，一边用脚踹我。到了西交民巷，他喘得更厉害了，我忍着疼，苦苦地哀求说：“老总，我实在跑不快，您另换趟车得了。”他说我故意和他为难，又打了我两棒子，踹我一脚，一钱不给，便扬长而去，我心里真是气得火冒三丈，暗骂这个鬼世道，一气之下，我索性不想干了。母亲安慰我说：“孩子，我们穷人生活在这个鬼世道，不忍气吞声可怎么办？你没看见，哪个拉洋车的不挨当兵的打，不挨警察的打。”为了生活，我只好又去拉车。在那时，拉洋车，不但经常

受本国人的气，还要受洋人的气。又有一次，我拉车到双栅栏胡同，一个美国人，从酒铺出来坐我的车，他说有急事，要赶回美国府，叫我跑快点，我使足劲在街上飞跑，可是刚一放慢点，他就跺脚，催我加快。因为跑得过猛，用力过大，我的心口热呼呼的，好象有一股热血要涌上来，我吓得不得了，幸好到了一个下坡，我才松了口气，血才没吐出来。等到了美国府，他却只给我一毛钱。

我在这里，再讲一个我蒙受不白之冤的故事，在我二十三岁那年，有一个人四十块钱买了辆车赁给我，让我给他拉包月车。一天，我把车放到街外，一个地痞把我的车锁到屋里不给我了，我去告状，谁知先把我捐了十八天才过堂，再找证明也没有了，最后断案的结果是让我赔六十块钱，我白白拉了一年才赔上这笔钱，你们说那社会黑暗到什么程度。

直奉战争那年，一天，我在丁桥豁子拉车，被一个军人抓到清河去运子弹，我哀求说：“家有老母，放我回去吧！”不行，我便白白地拉了两天车。正巧遇到一个姓曾的要进城，我借机拉他才得以逃脱。

廿八岁那年，我又在宅门拉包月车，我跑得快，每天拉着这宅子里的医生出外看病。看一次病我就能得到病人家给的四毛钱零钱。主人看我挣钱太多，找了个碴

儿（因为替我拉过一天车的人拉得慢）便把我辞了，以后我就去学泥水活手艺，那年月，穷人生活没保障，哪还有条件娶媳妇，一直到三十多岁，我才成了家，不久，日本就来了。

一九三七年，北京沦陷了，日本军队横行霸道，日本人的汽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，撞死人的事很多。跟日本鬼子言语不通，坐车偶尔也有给钱的，也有的，你刚一张口要钱就打你，中国人受的欺侮就说不尽了。有一次，我亲眼看见一个七、八岁的日本小孩，跟在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国人后面，一边走一边踢，这个中国人一直躲到马路边上，不敢怎么着这个小孩。你一理他，就可能惹下大祸，我在旁边看了心里难过极了，心里想：中国人就这样失去了尊严，而这就是所谓的“东亚和平中日提携”下的真实情况。

在沦陷期间，报上说物价大涨三次，实际上六次也得多了，东单排楼上写的粮食大落价完全是块空招牌，当时吃配给的“混合面”，据说是用五十六种粮食混合面成的，又黑又牙沉，很难吃，吃了以后又烧心，面喝了水后又拉稀。当时还闹传染病，日本人一看到拉稀的，就叫“霍利拉”，为了杜绝传染，他们又常常把患病严重的人拉走烧死，在新平路一个拉洋车的得了“霍利拉”，日本人就拿白灰在他四周划了一个圈，不许他出

来，就看着他干坐在里面哭。一会儿，来车就给拉到齐化门外烧了，所见者无不难过。那时候，如果哪条街上有小孩出天花，街上的人都不让出去，穷人家里没存剩，等着出去挣钱，出不去时，有的家就得挨饿。即使白天出去一天，累得要死，回来还得轮流值“防空演习”，伪政府新民会也常常抓劳工，等等。

日本人在时，在中国还搞强化治安，有计划地灭亡中国，一次比一次搞得紧，到第四次强化后，“前三门”就禁止出入了。当时，家家晚上全不许点灯，每个人发一个居住证，随身携带。有一天我出去没挣着钱，就在小摊上赊了顿饭吃，并且商量暂把居住证压到那儿了，可巧路上碰到了检查的，由于我没有，就把行车执照给扣下了，不能拉车，钱从哪儿来？只得赔上五块钱，用居住证把行车证给赎了回来。

除此之外，日本人还搞“交通安全周”。马路上都划好白线，车不许轧白线，伪保甲长还派人站岗，不远就是一个人。有一天一个伪警察硬说我的车轧了白线，而罚了我五元钱。那时伪警察也欺侮人，和平门一带有个姓王的警察，他经常勒索小商贩，谁都讨厌他，就是摆脱不了，每天下班都让我白拉他回家，有一次我特意花了一元五角请他喝了一顿酒，这以后才算饶了我。

还有那时日本人为了军事需要到处搜罗铜，保甲长

为了向日本人“献”铜，讨日本人的好，就向老百姓硬要，不管什么器具，是铜的就要献出来。而且保甲长还趁机勒索，人家摆设的器具明明是银的，他硬说是铜的，顺手牵羊，硬夺硬抢，简直是明火，许多人家都把成件的器物砸扁了以泄气愤。这些欺侮真是难以忍受，那时咱还不知八路是怎么回事，提心吊胆的真恨不能有把枪去打日本才能解恨。

从1941年起，我改蹬三轮，后来又作泥水活，但是钱越来越不值钱，蹬一天才挣五块钱，还不够一个人吃杂混面儿的。人民生活真是没有一点出路，都盼望拉抗战早日胜利。

四、走了狼来了虎

日本投降了，人们欢腾不已，满以为可以有好生活了，谁想到走了一群狼，又来了一群虎。美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接收大员的闯入，又把人民抛入生活的火炕之中，物价落了没有半个月然后又涨了上去，美国兵的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，捐税如牛毛……

有一次我蹬车到西单商场，前边有一辆车挡住了路，我正要超车，后边来了一辆军用车把我的三辆给挤扁了，我抓住了汽车门不放，车里两个军官用军刀刀背没命的砸我的手，疼得我一松劲儿，汽车就跑了，真是

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我只好当了夹袄把车修了。又有一次我拉着车回家吃饭，走到西单牌楼，两个军人坐车，旁边一个小孩一毛钱就拉了，我想最低也得两毛钱呀？军人说行，于是我就拉了，等到了东安市场，他下了车只给了一毛钱，我说：“老总，您不答应给两毛钱吗？”军官踹了我一脚边骂边说：“他妈的，给你钱就别不知足了？”他们还把我胳膊给掰了，现在我一个胳膊就伸不直。旁边人看着不平，就对不远的警察喊：“俩人揍一个拉车的，你怎么不管呀？”警察装没听见，把脸一扭，就是不管，多气人。

在外边挨打受气，在家里食不饱肚，舍不避寒又赶上房东卖房子，强迫我们搬家。1948年那阵正闹房荒，租不着房子，即使有房每月租金一袋洋面，未搬入先要预付一年的房租，即十二袋洋面，我们这穷得跳河都不沉底儿的怎么住得起呀？孩子饿得直叫爸爸，我胳膊又疼，房又住不成了，真是没活路了，我心想都是自己没能耐，于是给我家里的磕个头就出门寻死去了，她不知是怎么回事，问我干吗去，我支吾了两句没有告诉她。

我走到北海大桥，看人太多，跳河会有人救，就在道旁躺着等了一会儿，人还不见少，我起来往西走去，到了西直门，太阳早就落山了，出城刚走不远，城门就关了。我走到高架桥头，看天还早，等到晚上九、十点